

三 華夷文化的碰撞與化合

夷入中國，則中國之。華夷文化的化合，在接觸之初，難免經過碰撞以至衝突的過程，然最終卻能達致相互尊重，和諧共處。而中華文化的多姿多彩，正是從無數次的碰撞之中擦出新火花的。

「漢文化中心」與「胡文化邊域」

從本質上說，所謂文化碰撞，其實是不同的文化類型之間的差異和矛盾的外化。中國幅員廣闊，古人有「十里不同風」的說法，鄰近鄉里之間尚且如此，自然條件與人文條件迥異的華夷民族之間就更加不用說了。

在胡文化生成的環境內，遊牧的生活方式，決定其與漢文化之間不同的生活和價值觀念。因為受到自身生態環境的限制，一旦和漢文化接觸，相較之下，其缺陷立即顯現。相對於漢文化的優越性，胡文化自然而然地轉化為一種低勢能文化。在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匈奴、鮮卑、羯、氐、羌等胡族先後進入漢地，胡漢文化之間的地位就處於這樣的情勢。

這些草原遊牧民族，本與中國壤斷土隔，但隨著文化生態環境的疆域界線發展，胡漢文化進入一個交互影響的文化場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文化的不相適應性日趨尖銳，在接觸之初，衝突與矛盾自然產生了。



大草原

從文化類型上來看，草原遊牧民族的文化本質，使這些民族形成一個「胡文化邊域」，與中原地區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「漢文化中心」兩相對立，激烈的民族衝突導至文化碰撞的連鎖反應。

南入中地，變風易俗

胡漢文化之間的不相容性，誠然，是民族間干戈頻起的內因之一。然而，也正是這種文化衝突中的對立面，使胡漢文化系統調適各自固有的文化結構，最終從適應的過程走向胡漢一家的格局。

胡文化的「漢化」與漢文化的「胡化」，由於受到政治力量的支配，在北魏時，走向融合的高峰。北魏孝文帝是推進鮮卑族漢化的卓越人物，他把都城從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遷到中原洛陽的舉措，在文化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這並非一般的都城遷徙，而是具有重大文化轉型意義的行動。

我們知道，平城地處恆山之北，處於遊牧文化氛圍之中，而洛陽位居神州腹心，遷都於此，既能顯示北魏政權為中國正朔之所在，又有利於加強對漢文化的吸收。事實上，也正是在古都洛陽，孝文帝在文化上推行了一系列的漢化改革，從改革胡制、禁穿胡服、禁說胡語，乃至改用漢姓、倡通漢婚，以及推崇儒家禮教等方面，進行了全面的更化。於是，胡漢文化之間的交流紐帶得以建立穩固的根基。



洛陽今貌

華夷雜居的情況是民族融合的表徵，胡人「語習中夏」，「多知中國語」，受到漢文化價值觀念影響而發生根本的變化。北魏崔浩曾言：「漠北醇樸之人，南入中地，變風易俗，化洽四海。」誠非虛言。

事實上，即使是後來的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滿族，雖以驍悍的草原遊牧民族入侵，甚至征服整個中國，然而，有意思的是，政治上、軍事上的征服者，在文化交融中最終卻被潛移默化，變成被征服者。古人所謂「用夏變夷」^①之論，其原初意蘊，即在於以先進的華夏文化改造落後的「蠻夷」文化。隨著歷史的進展，漢民族的血統一次一次經歷了新變。宋、遼、金、元時期，下及清代，中華民族的文化整合再次顯現出文化碰撞與化合的機緣。

比較而言，胡文化受容於漢化的濡染較多，但是胡文化也以其固有的特質對漢文化造成一定的衝擊。尤其是胡文化中驍悍強勁的氣格，給溫潤儒雅的漢文化帶來了迥異的氣息，文學文化史上所謂「魏晉風流」，和胡風的滲入不無關係，迨至公元八世紀前後璀璨多彩的盛唐文化，都不能忽視其與胡漢文化化合的歷史現象。

滿漢文化的融合，則更清楚說明這一點。漢文化典籍的大量整理，對漢族傳統文化、道德規範、典章制度、禮儀習俗的重視，以至最終形成旗民雜處，滿人不能說滿語的現象，凡此，都說明胡漢文化的交融，正不斷超越自身的文化傳統而出現新貌。

中國人常說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。」今天，華夷文化之間的激烈碰撞已在歷史的長河中流逝了，相反，「兄弟」間相親相愛的和睦精神，卻歷久彌新，早已超越了狹隘的華夷觀念。

^① 《孟子·滕文公》。